八路军上、下鹤山浴血歼敌

孟 纬

1939年3月24日，八路军晋察冀第二军分区四团夜袭上社镇日军据点，使敌人损失惨重。25日，日军派兵“报复”，被四团设计诱敌至上、下鹤山地区，加以歼灭。此次战斗，八路军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挫败了日军进犯晋察冀边区的企图，坚定了根据地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八路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

从容部署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各一部以及地方工作团部分人员共约3000人，在山西省五台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1月上旬，上述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基本控制了平绥、正太、同蒲、平汉4条铁路干线之间的广大地区。11月7日，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五台山地区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两万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千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1938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连续对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平津铁路进行破袭作战，并挫败日军的多次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抗日游击战的不断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惧。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采取“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作战的重点指向华北八路军。敌人不断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到华北前线，并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加紧“扫荡”根据地。

针对敌情，八路军制定了坚持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平原的相应对策，使主力机动于平原和山区之间，对日军的进犯进行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并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的日军予以歼灭性打击。

1939年2月开始，晋察冀军区积极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按照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整军训令，对全区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军。整军后，晋察冀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和六个主力团。其中，第二军分区辖第四团，由韩伟任团长，萧文玖任政治委员。第四团在整军中，进行了形势教育，开展了军事训练，不仅人员得到了补充，武器装备也有了改善。经过整军后的四团干部战士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求战情绪十分高涨。

二分区所在地位于正太铁路以北的河北和山西交界处，是晋察冀军区的西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1939年以来，日军不断派兵到二分区“扫荡”，均遭到二分区军民的有力反击，被打得损兵折将。

夜袭破敌

日军不甘心失败，命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部进占山西省盂县上社镇，企图以此为基地，对二分区进行“蚕食”，继而将占领区扩展到滹沱河两岸。

第二军分区首长得到情报后，立即命令四团出击，坚决消灭来犯之敌，保卫抗日根据地。根据军分区首长的指示，四团于3月20日夜由五台县境内的豆村地区南下，22日进至上社镇东北集结。

据侦察员报告，盘踞在上社镇的日军有一个中队兵力，拥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等武器。这股敌人占据该地时间较短，虽然仓促间修筑了工事，但并不牢固。四团领导经研究后决定夜袭，一举“端掉”敌人的据点。

24日午夜，四团参战部队秘密来到预定位置，四团第三营率先发起进攻。突击队员很快夺取了上社北山的两个堡垒，并攻入镇内。日军从睡梦中惊醒，组织力量反击，被三营战士“一顿”手榴弹打了回去。

敌人见反击无望，只得退入几所坚固的住宅，凭借武器优势拼命顽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击毙敌人50多人。但因天近拂晓，敌人飞机赶来扫射轰炸，为了避免伤亡，四团指挥员随即命令战士们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上社以东一带隐蔽。

英勇阻击

对于“撤出战斗”，有的战士表示不理解，指挥员遂向各级指战员传达指示：“根据以往经验，敌人挨了打后，一定会派兵向根据地‘扫荡’‘报复’。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埋伏，等敌人来，在路上打他个有来无回！”战士们听后顿时情绪高涨，立即抢占有利位置，加紧准备武器弹药，耐心等待敌人的到来。

25日清晨，据侦察员报告，驻盂县县城敌人出动3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进入上社镇，和里面的残敌会合。正午时分，上社镇的敌人分为南北两路出动，在大炮的掩护下，向上、下鹤山方向进犯。一切正如四团指挥员所料。

四团团长韩伟迅速登上大水头的西山，在此设立了指挥所。韩伟经观察后，立即命令通讯员跑步通知在上鹤山、秋林坪之间的一营和在窄门村的二营立即出动，迂回到敌人侧后，协同正面阵地的三营围歼敌人；同时命令三营必须守住大水头以西一线高地，以待团主力迂回后围歼敌人。

按照指挥员部署，三营营长彭光炳命令九连连长姜启武马上带部队抢占上鹤山主峰的1480高地，七连占领主峰右翼的1147.9高地，两个连分别从正面阻击两路敌人，迫使两路敌人向中间靠拢；八连在指挥所稍后的1450高地上，作为该营的第二梯队，随时准备支援。

九连指战员接到命令后迅速向1480高地攀登。敌人发现了九连，于是派出部分官兵，疯狂向山顶攀爬，企图抢在八路军之前占领制高点。当敌人爬到半山腰时，九连战士已经登顶成功。在九连的猛烈打击下，敌人被击毙十余人，幸存者慌忙逃下山去。

此后，山下敌人开始用迫击炮和山炮向九连阵地轰击，九连战士隐蔽在巨石后躲避敌人的炮火。当敌人开始冲锋时，战士们立即回到工事，利用险要地形，向敌人射击。战斗中，九连连长姜启武不幸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指导员周同立刻接替指挥战斗。他一面指挥，一面连续投弹48枚，炸死了不少敌人；三排长易先兰右手负伤，就用左手单手投弹；一排副排长李文林、一班战士张焕龙负伤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全连指战员连续和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虽遭受很大伤亡，但仍顽强坚持战斗。日军数次冲锋均被打退，竟然施放毒气。九连指战员尚不具备预防毒气的经验，不少战士接连放毒气袭击而被迫退出了阵地，1480高地失守了。不久，七连战士也由于敌人施放毒气而无法坚守，1147.9高地经过反复争夺后也被占领。日军占领制高点后，立即架起迫击炮，居高临下向八路军射击，三营营长彭光炳见状，亲自指挥七连反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成功合围

危急时刻，四团副团长曾保堂率领第一营成功迂回到敌人侧后。赶到战场后，第一营一面以一部从敌人右翼发起进攻，成功牵制住敌人部分兵力，一面派出部分战士支援三营七连，向1147高地发起进攻。韩伟见援军到来，立即抓住时机，命令预备队八连投入战斗，配合九连夺回1480高地。八连和九连的战士们在副营长李学琴的率领下，勇猛地向山上冲去。高地上的敌人早已疲惫不堪，突然见八路军的生力军杀到，惊恐万状，只得硬着头皮迎战。八连和九连战士们越战越勇，很快冲上了高地，由于制高点的丢失，日军无奈之下只好交替掩护着向上社镇溃退。一营、三营指战员不顾疲劳，同时向敌人发起追击战。战斗中，一营营长洪大平不幸中弹牺牲。

战斗持续到傍晚时分，敌人虽一路狂奔，但始终无法摆脱一营、三营的追击。突然，在敌人撤退的道路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四团政委萧文玖率领二营从窄门村出发后，首先击溃了上社镇赶来增援的另一股敌人，然后经过急行军赶到了战场，切断了敌人的逃跑之路。

见二营杀来，一营、三营指战员军威大振。四团前后夹击，很快将残敌包围起来。冲锋号响起，战士们发起了最后的攻势，很快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并加以消灭。残存的日军为了逃命，在山沟里到处乱窜。领队的日军中队长石冢带着几个日本兵被四团战士们包围在一块巨石下。石冢还企图顽抗，被四团战士当场击毙，其他几个日本兵见状，投降当了俘虏。

至此，经过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四团赢得了这场歼灭战的胜利。此次战斗，四团击毙日军300多人，缴获步机枪近200支，战马十多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名在战斗中被俘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上、下鹤山战斗，让他见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

战后，四团指战员受到了晋察冀军区首长的表彰。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解放军普济观战斗破“清剿”

贾晓明

篇后拾遗 PIANHOUSHIYI

1947年12月，在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失败，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组建中共江汉区委、军区和行政公署，领导开辟江汉解放区的战略任务，同时组建洪山、鄂中、襄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12月下旬，为了掩护江汉军区主力和其他军分区部队战略展开，襄南军分区部队按照上级部署，迅速进入襄南地区，对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打击，恢复并发展了襄南解放区。

国民党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得到解放军在襄南活动的消息后十分惊恐，慌忙拼凑部队发动“清剿”，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驱逐”。在接连两次遭受失败后，白崇禧又于1948年4月动用10个团的兵力，向襄南发起第三次“清剿”。

中共襄南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针对国民党军此次“清剿”特点，命令襄南军分区主力部队适时转到外线作战；同时命令襄南解放区地方武装、民兵组成游击集团，以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配合军分区主力歼灭进犯之敌。

从4月7日开始，襄南军分区主力部队主动出击，连克江陵境内的三岔河、张家场和资福寺等地；地方武装则不断袭击各地敌人驻军和交通线，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

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襄南军分区于5月下旬发起了攻打普济观的战斗。

当时，普济观驻有国民党军一九二旅第一团主力。5月25日，中共襄南地委和襄南军分区在沙岗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普济观战斗方案。会议决定，集中分区主力和江监石、江荆潜、监沔、天潜沔4个指挥部的武装，一举消灭普济观守敌。具体战斗部署是：军分区部队第一营布防普济观西南的彭家台、赵家港、五家台一线，以防新厂敌人增援；二营布防在普济观正南陈家湾、曾家湾一线，随分区司令部一起，随时驰援麻布拐或一营阵地；三营布防于普济观东南方的聂堤、齐家堤口一线，以便增援麻布拐方向。天潜沔指挥部设防于普济观东面的台湖、黄家庵及其北面；江监石指挥部驻守普济观东南的齐家河岭、陈巷一线；监沔指挥部则据守普济观西面的瓦子岗、周家塔一线。上述3个指挥部构成对普济观的包围圈。江荆潜指挥部和分区警卫营则在普济观东南方向的麻布拐设伏，构筑工事，以便坚决阻击从监利增援普济观的敌人。

25日夜晚，各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迅速完成对普济观的合围，中共普济地下区委除组织全区贫农团有战斗经验的团员参加作战外，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担架队、运输队支前。

28日，对普济观守敌实施包围后的第3天，驻守监利县城的国民党军两个营驰援普济观。当这股敌人进至麻布拐时，在此设伏的江荆潜指挥部和分区警卫连按作战预案，没有阻击，放敌人继续前行。午后，这股敌人的先头部队抵达齐家堤口，立即遭到分区部队三营的阻击。与此同时，襄南军分区部队主力迅速向麻布拐迂回包抄，和原已埋伏在这里的江荆潜指挥部武装、分区警卫连，构成了对麻布拐的大包围圈。战斗打响后，敌人大部被歼，残敌拼命突围，向监利方向回窜，途中又被江监石指挥部武装拦截。襄南军分区部队随后赶到，集中炮火向残敌进行轰击。敌人走投无路，乖乖缴械投降。

麻布拐战斗一结束，襄南军分区参战各部立即回师普济观。由于动作迅速且隐蔽，普济观内被围之敌竟然没有察觉到城外解放军的军事调动。随后，解放军将俘虏押至普济观外喊话，以瓦解守敌军心，又“露出破绽”，“撤走”普济观西、北门外的部分部队。30日拂晓，普济观敌人从北门、西门分别出逃。他们刚刚离开普济观不久，就被埋伏在镇外的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分割包围。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被围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至此，历时7昼夜的普济观战斗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此次战斗，解放军襄南军分区部队共毙伤国民党军官兵近1000人，俘虏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受到中原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普济观战斗后，各地的国民党军害怕被歼，纷纷逃走，襄南军分区胜利粉碎了白崇禧的第三次“清剿”。

漆鲁鱼机智脱险

龙 悦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漆鲁鱼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长、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等职。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重庆当局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组织上立即指示漆鲁鱼迅速离开重庆，隐蔽前往成都、西康，继续开展工作，并安排人员掩护。

漆鲁鱼得到指示当天，已发现有特务在身后跟踪。他从容来到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总行，和银行职员朱斯白（地下工作者）接上了头。漆鲁鱼故意大声问道：“你们经理在吗？我要找他接洽一笔报馆的汇兑业务。”朱斯白心领神会，立即将漆鲁鱼让进了后面的办公室。特务并没有跟进来——由于当时重庆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依山建筑，没有后门，因此特务以为只要守在正门，漆鲁鱼就“插翅难飞”。但特务不知道的是，这家银行不久前开了一个“边门”。朱斯白在办公室帮助漆鲁鱼化装成脚夫模样，将他从边门送出。

漆鲁鱼立即前往四叔娘凌树珍家，向凌树珍简要托付了工作，然后赶往码头，乘小船离开重庆。

小船行驶到一个码头时，漆鲁鱼上岸，准备在这里换乘长途汽车继续赶路。就在此时，码头上突然来了几个国民党宪兵，让所有人排成一排，逐一搜身检查。当宪兵检查到漆鲁鱼时，皮箱中的书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正要盘问，忽然一个人走了过来，和宪兵们“亲切”地打了招呼，又向宪兵们“介绍”漆鲁鱼说：“他是一个老师，我的本家亲戚，此次‘来重庆’，是为了到这边教书，现在我来接他去旅馆。”说着又给领头的宪兵手里塞了些“好处”。宪兵们随即放行。

当晚，漆鲁鱼被“本家亲戚”安排在一家客店，“本家亲戚”又帮助“处理”掉了漆鲁鱼随身携带的“书籍”。

第二天，漆鲁鱼被送上一辆开往成都的长途汽车，并被司机安排坐在最后一排。他发现，座椅脚下车厢地板破了一个洞，上面盖了一块木板。夜间，汽车开进一个县城小站，车上人员需要在此休息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由于防空原因，县城里灯火管制，车站内一片漆黑。车到站后，特务堵住车门逐个检查旅客。每下去一名乘客，特务就点燃一根火柴照一下脸。漆鲁鱼趁人们争先下车时，迅速从脚下的洞中下到汽车底盘的缝隙中隐蔽。当乘客全部下车后，特务在车门处划了根火柴向内张望，见车厢内已“空无一人”，随即离开。

漆鲁鱼随后按照事先约定来到一家小客店。客店掌柜把他安排到杂物间，然后从外面把门反锁。不久，警察前来“查夜”，掌柜与伙计出面搪塞了过去。警察走后，伙计打开锁并告诉漆鲁鱼说：“明天天不亮就有一批军车去成都，已经为你买了‘黄鱼票’（私自带人的货车票）。”

第二天天不亮，伙计将漆鲁鱼送到车上，并用篷布帮他隐蔽好。当天，漆鲁鱼安全抵达成都，开始了新的战斗。

红军延川游击队的建立

杲学军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30年秋，共产党员刘善忠回到陕西开展工作，与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相识。高朗亭此时正积极筹建游击队，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刘善忠听了高朗亭的想法十分赞成，愿与他共同创建革命武装。

1931年1月，高朗亭设法买到4支手枪，并和刘善忠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武装宣传小组。他们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一带，积极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发动人民群众，组织秘密农会，建立联络网点，为党组织传递情报，保护来往人员。经过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的不懈努力，到1932年1月，已发展到18个联络点，数十个秘密农会。

1932年2月底，刘善忠和高朗亭等向中共延川县委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进展。延川县委通知他们：可以伺机发动起义，组建红军游击队，并责成刘善忠、高朗亭负责。

3月11日，刘善忠、高朗亭等来到清涧县淮宁湾开展工作，途中听说淮宁湾雷珠山驻扎的民团团总邱树凯和部分民团因事外出的消息，便决定抓住这个时机上寨夺枪，解决“人多枪少问题”。

3月12日中午，刘善忠、高朗亭等3人化装成绅士来到雷珠山寨子外，向守寨团丁说他们是邱团总的朋友，今日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团丁们见三人派头不小，又是“团总的朋友”，不敢怠慢，连忙打开寨门迎接。

三人进入后，和留守的民团队长寒暄客套，叙述着和邱团总的“深厚交情”。民团队长有意巴结，领着三位“团总的朋友”在寨内各处参观，并吩咐团丁准备酒饭招待。刘善忠、高朗亭等在掌握了寨内情况后，借出外小解的时候互相进行了商议，决定趁吃午饭的机会，把团丁们调动到一个窑洞里，一举将他们俘虏。

开饭后，刘善忠、高朗亭等“热情邀请”寨中团丁一起进餐。团丁们受宠若惊，全部聚到一个窑洞里，把携带的4条枪放在墙边，陪着3人吃了起来。

正当团丁们狼吞虎咽之际，刘善忠、高朗亭三人离席而起，说声“兄弟们慢慢吃，我们到上窑吸烟饮茶去了”，便来到团总办公室，将放在这里的两条枪取下，轻轻拉开了枪机，紧接着压进了一排子弹，然后奔回窑洞，把枪口对准还在吃饭的团丁们。刘善忠等大喝一声：“不许动！”当团丁们不知所措之际，高朗亭一个箭步走到墙边，把墙边放置的四条枪和子弹袋夺了过来，随后高声说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团丁们吓得跪在地上磕头求饶，3人把他们关进一间小屋，然后打开了团总的柜子，缴获了里面存放的弹药，并将里面的票据、账本付之一炬，然后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胜利而归。

3月13日夜，刘善忠、高朗亭带着战利品来到延川县田家川五号联络站。中共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早已在此等候。曹必明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当场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正式成立，刘善忠为队长，高朗亭为政治委员。

14日，刚刚成立的游击队北上绥德，消灭了留仙嘴村的地主武装，并烧毁帐契，开仓济民，得到了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不几天，队伍便扩大到70余人。

韩寿臣部起义前后

常 红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韩寿臣生于山东安丘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率所属自卫队及乡农学校部分学生百余人组成“抗日保乡联防队”，进行过一些抗日活动。不久，该队被国民党军厉文礼部收编，韩寿臣先后在厉部任大队长、团长。1939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挺进安丘抗日，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曾派代表与韩寿臣谈判共同抗日事宜。共产党、八路军的统战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韩团政训处主任张竹坡的支持。韩寿臣也与八路军保持了较好的联系，表示“互不侵犯”。不久，八路军派张俊千等十几名党员先后进入韩团，向广大士兵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激发起广大士兵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很快在韩团内发展了40多名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

1943年8月，厉文礼公开叛变投日，任命韩寿臣为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副指挥兼十团团长。对此，八路军鲁中四军分区制定了“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后数次派人与韩寿臣及其代表谈判，使韩寿臣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5年6月5日，八路军鲁中部队发起讨伐伪军厉文礼部的战役，仅用三天，就击溃伪“鲁东和平建国军”指挥胡鼎三的抵抗，攻克厉文礼总部驻地夏坡村及16个敌伪据点。在战役打响前，八路军派张俊千与韩寿臣进行了谈判，希望他能在讨厉战役中率部起义。讨厉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韩寿臣看到连装备最强的胡鼎三特务团都被打垮，更加坚定了起义决心。

起义前三天，八路军鲁中四军分区副政委李耀文、敌工科长兼昌潍办事处主任范筱文、敌工科干事张世祥、联络科长张俊千在城南车戈庄小学与韩寿臣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研究了韩团起义的具体措施，并决定在八路军攻打厉部第十六团王子春部时，韩寿臣配合战斗，并率全团起义。

6月22日夜，李耀文率八路军向伪军王子春部发起猛烈进攻，同时派一个连来到韩寿臣团部，策应其起义。同日，韩寿臣带领4个营在古城子宣布起义，并迫使胡鼎三特务团的一个营同时起义。随后，张世祥率部分指战员前往韩寿臣部尚未参加起义的其他3个营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张世祥等的努力下，韩部的这3个营也宣布起义。

1945年7月15日，起义部队被八路军山东军区授予“独立第四旅”番号，韩寿臣任旅长。